

目 录

唐代吐蕃文化史研究二三则	林冠群 / 1
布达拉宫馆藏多巴·扎西杰布所绘唐卡初考	旦增央嘎 班旦次仁 / 19
甘肃永登感恩寺明代宗喀巴传记唐卡研究	赵媛 杨旦春 / 39
故宫博物院藏乾隆三十五年藏文泥金《甘珠尔》经造办、流传与存藏考述	李若愚 / 117
以母范而兼帝范——普陀峪定东陵隆恩殿佛楼研究	王彦嘉 / 141
清代前期松潘河源道初探	张钦 / 162
从屯堡到番寨：明清青海同仁地区的聚落变迁与社会转型	许若冰 / 178
司徒班钦加德满都谷地之行与文化交往的考察	姚婧媛 / 192
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府的人事管理档案及人事管理制度研究（1794—1957 年）	道帏·才让加 / 210
十三世达赖喇嘛自库伦返藏考论	刘维栋 / 250
《究竟瑜伽鬘》摘译——金刚萨埵曼荼罗、智慧空行母曼荼罗、喜金刚曼荼罗、 无我母曼荼罗	张雅静 / 266

跨文化背景下尼泊尔离车碑铭的历史价值：过去、现在与未来

..... 阿闍黎·启昼、明霓 著 罗鸿 译 / 293

摘 要 / 315

Table of Contents

A Study on Three Topics of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ubo <i>Lin Kuanqun</i>	1
A Preliminary Study of a Thangka by Mdo pa Bkra shi rgyal po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otala Palace <i>Tenzin Yangkar Paldan Tsering</i>	19
A Study of a Ming Dynasty Thangka of Tsong kha pa's Biography Housed in the Gan'en Temple, Yongdeng County of Gansu Province <i>Zhao Yuan Yang Danchun</i>	39
Notes on the Creation, Transmiss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Golden Ink Kanjur Made in the Thirty-fifth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 Housed in the Palace Museum <i>Li Ruoyu</i>	117
Maternal Model and Emperor Normalization —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Building in the Long'en Hall at the Dingdong Mausoleum in Putuoyu <i>Wang Yanjia</i>	141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ongpan-Heyuan Route during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Zhang Qin</i>	162
From Farming Forts to Tibetan Villages: Settlement Change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Reb gong Area of Qinghai Provinc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Xu Ruobing</i>	178

An Investigation of Situ Pañchen's Visit to the Kathmandu Valley and Cultural Exchanges <i>Yao Jingyuan</i>	192
A Study of Officials Management Archives and Systems of the Dga' ldan Pho Brang Local Government in Tibet (1794-1957) <i>Dobis Tsering Gyal</i>	216
A Study of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s Return to Tibet from Kulun <i>Liu Weidong</i>	250
Selected Translations from the <i>Niṣpanṇayogāvalī</i> : The Vajrasattvamaṇḍala, Jñānaḍākinīmaṇḍala, Hevajramaṇḍala, and Nairātmyāmaṇḍala <i>Zhang Yajing</i>	266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Licchavi Inscriptions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Research <i>Diwakar Acharya and Nina Mirnig</i> <i>Chinese Translation by Luo Hong</i>	293
ABSTRACTS	315

以母范而兼帝范

——普陀峪定东陵隆恩殿佛楼研究^{*}

王彦嘉

内容摘要：普陀峪定东陵作为清代晚期长期实际掌握政权的慈禧皇太后的陵寝，相较于其他清代后陵具有诸多特殊之处。在终清一代的七座后陵中，专门在隆恩殿暖阁中兴建专门供佛空间的只有葬有乾隆帝生母崇庆皇太后的泰东陵和慈禧皇太后的普陀峪定东陵两座。因普陀峪定东陵的佛楼系慈禧入葬后添建，档案文本的连续性与光绪朝的主要工程有着天然割裂，其兴建始末一直未得到充分的探讨。从时间节点上看，工竣于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十五日普陀峪定东陵佛楼亦是终清近三百年来宫廷宗教建筑的收官之作。佛楼本体与隆恩殿内的大部分装修陈设均在1928年孙殿英盗掠东陵事件中被荡涤殆尽，存世仅十余年。本文结合内务府、礼部、工部、宗人府及相关图纸画样对普陀峪定东陵佛楼的兴修和湮灭始末进行一次较为详细的探究和梳理，并结合宣统朝初年的政局与佛楼的修建的关系做一尝试性探讨。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代朝觐制度与中央治藏方略研究——以六世班禅朝觐文物考察为中心”（22JJD780013）的阶段性成果。

前言

定东陵是为清朝第九位、入关后第七位皇帝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訢（1831-1861年）的两位皇后孝贞显皇后钮祜禄氏（1837-1881年）和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1835-1908年）的陵寝，分别位于清东陵陵区的普祥峪和菩陀峪，故一般分别称为普祥峪定东陵和菩陀峪定东陵。二陵设计一同肇始于同治元年¹（1862年），主体工程竣工于光绪五年（1879年）。其中葬有叶赫那拉氏的菩陀峪定东陵主体工程后续又经过多次大规模改建最终完工于清亡之际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其从初始选址设计到最终完工历时近半个世纪。在前辈学人的相关研究中，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团队因早期深度参与了清东陵的测绘工作，成果最为系统全面。王蕾的《清代定东陵建筑工程全案研究》²发掘和整理了相关样式雷图档及宫廷档案，还原了当时整个工程的设计程序、设计理念和图像配置，填补了中国传统建筑史研究中的一些空白。杨莹的《清陵隆恩殿建筑研究》³通过实地调研勘察，结合史料文献，对诸陵隆恩殿的各作做法进行了详尽的对比研究。清东陵管理处的徐广源先生也曾于自媒体上披露过一些清东陵未开放区域的相关图像和文本史料，这些学人的研究成果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研究基础，开拓了笔者的研究思路。此外笔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的宣统朝军机处档案折件中，发现了全套为上呈御览而绘制的菩陀峪定东陵佛楼图纸画样，这一图样和内务府、礼部、工部、宗人府等衙门的档案材料一起构成了本文研究菩陀峪定东陵隆恩殿佛楼的主要基石。李欣荣的《臣掌君权：载沣摄政礼节纷争与宣统朝权势新局》细致地论述了宣统朝初期监国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的政治博弈，援引了大量一手史料，为隆恩殿佛楼兴建原因提供了大量线索⁴。

菩陀峪定东陵佛楼系由东陵守护大臣贝勒载瀛在慈禧入葬后的次年即宣统元年（1909年）提议兴建，其兴缮过程于《菩陀峪万年吉地工程备要》《堂谕档普祥峪菩陀峪纪事》《随工日记》等前期主要工程档案中均无记载，档案文本的连续性上与光绪朝的

1 “八月廿四，中堂大人四堂在朝内面回恭王爷、宝大人（宝璠）云：此次前往相度地势，派梁椿、雷思起随同当差。绵大人云：他二人当差甚好。王爷大人云：甚可。英大人面谕雷思起：着将同治元年正月奏奉旨留中成子峪、普陀山、松树沟三处地势画样并总图以及昭西陵全样，均预备妥当，听候信息，随同前往。”样式雷图档 366-00211：《堂谕档普祥峪菩陀峪纪事》。转引自王蕾：《清代定东陵建筑工程全案研究》，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196。

2 王蕾：《清代定东陵建筑工程全案研究》，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3 杨莹：《清陵隆恩殿建筑研究》，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4 李欣荣：《臣掌君权：载沣摄政礼节纷争与宣统朝权势新局》，《清史研究》2021（5）：126-139。

主要工程有着天然割裂，故长期未被相关领域学者纳入研究视野。事实上，在清代数百年形成的系统性的礼制规范下，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帝、后，无论是其生前居住宫殿的设计、布局及其陈设还是死后的丧仪、陵寝的陈设布置均有非常明确的规范和要求。但在现存的成文的礼制规范中，对帝后陵寝中的佛楼修建并无明确的制度性规范，然而在实际运作当中，还是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例行制度”⁵。自乾隆帝的裕陵始，直至光绪帝的崇陵止，共计有五座帝陵在其隆恩殿暖阁中建有佛楼⁶，其主要功用是为了陈供蒙藏地区高层僧俗向皇帝致祭所进的唐卡和造像⁷。在清代后陵中可称为“佛楼”的实质上仅有慈禧的菩陀峪定东陵一座，而崇庆皇太后泰东陵的所谓“佛楼”在档案材料中被称为大龕⁸，且为单层，其规制与菩陀峪定东陵中仿帝陵规制而建的佛楼不可同日而语。本文对菩陀峪定东陵隆恩殿佛楼本体的兴建始末进行梳理外，还结合相关史料对该佛楼与隆裕太后的可能性关联进行了探讨。

菩陀峪定东陵隆恩殿佛楼从建成到1928年被孙殿英盗掠，其存世时间仅有十七年，在其消失近百年的今天，很多研究者已经对这座曾经存在过的楠木佛楼一无所知，唯有殿内的金柱和梁架上尚有其曾存在过的拆装痕迹，台北故宫藏189390号军机处档案折件中的附件《菩陀峪隆恩殿定东陵陵内新建楠木佛楼立样图式》也向我们展示了这座清代最后一座宫廷宗教建筑曾经的辉煌背影。

一、隆恩殿中的神圣空间

以藏传佛教作为联结蒙藏的文化纽带从清初伊始就是清代基本的政策，在“兴黄教以安众蒙古”⁹政策取得良好成效的背景下，乾隆帝更进一步将清代皇帝在藏传佛教话语体系内高度神格化，试图在无上的世俗统治力之上再加强其宗教层面的影响力。这一特点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撰写的《重修弘仁寺碑》中表现的可谓淋漓尽致：

5 在内务府档案文件中经常可以见到“恭查……某某年例”的字样，即为这套例行制度的具象化表现。

6 兴建佛楼的帝陵计有：裕陵（乾隆帝之陵）、昌陵（嘉庆帝之陵）、定陵（咸丰帝之陵）、惠陵（同治帝之陵）、崇陵（光绪帝之陵）。

7 “奴才等案查同治五年四月十九日准理藩院咨开因前后藏喇嘛恭诣定陵呈进佛像等贡，曾经仿照裕陵佛楼规制修建佛楼一间以备供奉佛像之用而昭敬慎。”详见载瀛：《奏请修建定东陵佛楼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04-01-37-0148-024。

8 “泰东陵东次间暖阁内安供红油大龕一座。”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40》，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414。

9 弘历：《御制喇嘛说碑》，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撰，碑现位于雍和宫。



图一 裕陵隆恩殿东暖阁佛楼（张元哲摄）

弘仁寺者，康熙四年奉勅所建，移供鹫峰寺梅檀瑞相于斯。我皇祖再世如来，现转轮王相，以金仙象教流传，资翊治化，因而远溯灵踪，俾人天广利。迄今垂及百年，丹雘之焕者日以剥，龙象之狞者日以削。¹⁰

在乾隆帝裕陵的装修布置中，其亦希望能在隆恩殿中辟出专区用以奉祀佛尊。乾隆十六年（1751年）的工科题本中，有一条乾隆十年（1745年）乾隆帝关于裕陵佛楼修建的上谕：

乾隆十年二月十七日奉上谕：隆恩殿内四角添安金柱四根；明间内照旧安设宝龕、宝床；东次间成做仙楼，下安设宝座；西次间床龕帐幔按依仪制陈设。钦此。¹¹

10 于敏中编纂：《日下旧闻考》第3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649。

11 《工科题本·建筑工程·陵寝坛庙》第二包，乾隆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题本。转引自清代宫史研究会编：《清代皇宫陵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20。

裕陵隆恩殿东暖阁佛楼是清代帝、后十六座陵寝中首个真正意义上的佛楼，其规格和型制基本上奠定了清代后世帝陵佛楼的建造规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乾隆帝在养心殿西暖阁内亦开始营建仙楼式佛堂¹²，有理由相信其间一定存在某种关联。裕陵隆恩殿东暖阁佛楼今日尚存（图一），总体框架结构基本完整，惜楼中陈设已全部无存。

乾隆帝之后的清代诸帝，除“一切工程务从朴实”¹³的道光帝慕陵外，均照乾隆帝裕陵样式于隆恩殿东暖阁内兴建了佛楼，即便是民国初年竣工的光绪帝崇陵亦无例外。但清代七座后陵中除乾隆帝生母崇庆皇太后在泰东陵隆恩殿暖阁内设有大佛龕外，其余六座后陵均未设有专用供佛空间。在乾隆朝的内务府活计档对泰东陵隆恩殿暖阁的供佛陈设有明确记载：

旨大龕添配两山板三面供挂像佛，再配三层踏跺一件，供佛三层，每层九尊，佛龕供案供器等项俱着金，派人送往供奉，钦此。¹⁴

泰东陵东暖阁面积虽然不大，但除大龕外还设有红油供案九张、踏跺三层¹⁵，在踏跺和供案上遍置唐卡、佛像、祭器（图二），其中大部分由崇庆皇太后生前居住的慈宁宫、寿康宫移来¹⁶。

泰东陵隆恩殿东暖阁内的大佛龕至今尚存（图三），除毗卢帽及垂花柱头已佚外，型制与崇庆皇太后生前居住的寿康宫东暖阁佛龕完全一致（图四），这种形制是乾隆朝大量制造的毗卢帽单层佛龕的常见样式。

结合档案记载和遗存可知，泰东陵隆恩殿东暖阁内的所谓佛楼实际上是佛龕，因泰东陵隆恩殿东暖阁的供佛空间并无佛楼存在，只因陈供佛像、唐卡、祭法器数量极多之故，让人以为是佛楼。因此我们可以说慈禧皇太后的普陀峪定东陵是清代七座后陵中唯一配置佛楼的陵寝。

12 关于养心殿佛堂的历史沿革情况，参见罗文华：《祭祖与礼佛：紫禁城养心殿一区的佛堂与清帝的信仰》，《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1）：89-103。

13 赵之恒等主编：《大清十朝圣训·清宣宗圣训、清文宗圣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7302。

14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40》，2005：414-415。

15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40》，2005：415。

16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40》，2005：414-415。



图四 寿康宫东暖阁佛龕（王彦嘉拍摄）

二、逾制的佛楼——以母范而兼帝范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清晨，咸丰帝驾崩于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清代第十位皇帝载淳在咸丰帝灵柩前即位。咸丰帝试图用遗诏的方式让中央政治权力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分权布局：顾命八大臣负责中央日常行政事务，获得起草诏谕的权力，皇后钮祜禄氏执“御赏”印，嗣皇帝载淳执“同道堂”印，控制了皇帝诏谕的钐印权¹⁷。

咸丰帝希望藉由此三角形权力结构，使内廷、外朝两方三者互相制衡，以期在载淳亲政之前使政权得以平稳过渡。但事与愿违，八大臣之首的肃顺在权力分配上与两宫太后龃龉不断，最终被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訢形成的政治同盟彻底推翻，叶赫那拉氏也藉

17 “两印均大行所赐，母后用‘御赏印’印起，上用‘同道堂’印讫。凡用朱笔者用此代之。述旨均用之，以杜弊端。”见《热河秘札》第十二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第36号，北京：中华书局，1978：13。

由皇帝生母的身份逐步取得了本属于载淳的政治权力，为之后实际执掌中国政权半个世纪一步步打下基础。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1861年12月2日）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到：

是日，天气晴和。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御养心殿。是日，内廷诸臣及王公大臣、六部、九卿于养心殿行礼，朝珠补褂，吏部带领引见。¹⁸

自此，慈禧太后开始获得清廷的最高实际权力，随着光绪七年（1881年）慈安太后猝逝，慈禧在宫内事务中失去最后的制衡力量。光绪十年（1884年）年的甲申易枢更是将恭亲王奕訢在外朝的力量荡涤殆尽，慈禧太后自此获得了外朝和内廷几乎全部的实际权力。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慈禧太后以光绪五年（1879年）年竣工的普陀峪定东陵需要修葺为名，将大殿、东西配殿、宝城、方城明楼等全部拆除重建，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负责具体承修¹⁹。

自此普陀峪定东陵开始了大规模的重修改建工作，直至十三年后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十五日，设计、建造时间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普陀峪定东陵才最终完工并通过竣工验收：

东陵总管内务府为咨行事：普陀峪定东陵恭办事务处案呈，恭查普陀峪处各殿工程业于本年十月十八日经承修大臣一律修理完竣，俱已查收。²⁰

普陀峪定东陵的两次营缮创造了清代后陵寝修建时间和耗资之最，其也和慈安太后的普祥峪定东陵一起，成为了清代七座后陵中规制最高的两座，二陵在同治朝初步设计阶段基本采用了完全相同的建筑规模、布局和施工工艺，在《堂谕档普祥峪普陀峪纪

18 陈义杰点校：《翁同龢日记》，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159。

19 “臣奕劻、臣荣禄谨奏为奏闻请旨事：窃臣等准勘普陀峪万年吉地应修工程，大臣徐桐等咨称，敬谨勘估工程一折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七日覆奏，初九日奉上谕：徐桐等奏勘估普陀峪万年吉地工程开单呈览一折，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所有普陀峪应修各工，着派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承修，钦此’庆亲王奕劻等务当督帅工员敬谨办理，单二件开发，钦此。……旨：知道了，钦此。”《军机处录副奏折·全宗工程类》，第534号胶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20 《内务府来文·陵寝事务》，第3011包，转引自王蕾：《清代定东陵建筑工程全案研究》，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论文，2005：227。

事》中，定东陵工程总监景瑞对烫样制作人雷思起的嘱托话语中²¹，我们依稀可以感受到当时二后并尊且极度敏感的政治格局。可见在两座定东陵的初次营缮中，菩陀峪、普祥峪二陵的基本形制基本保持了完全一致。

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档案材料中，笔者还发现了一封奏疏，系东陵守护大臣镇国公载迁于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奏的《奏为达赖喇嘛专差叩谒定东陵镀金佛像可否请至隆福寺庙内供奉等事宜请旨事》，折内对慈安太后的普祥峪定东陵暖阁相关情况进行了细致描述²²。

由本折可知，截止慈安太后已入葬七年后的光绪十四年，普祥峪定东陵隆恩殿内尚无佛楼，达赖喇嘛²³致祭慈安太后所进的佛像和唐卡被置于东暖阁专门现做的供案之上²⁴。由此可知，即便在诸多方面多有逾制的两宫太后陵寝之中，长期亦无专门的佛楼存在。但在几乎同时（1875年）开工的同治帝惠陵中，一开始就规划了东暖阁佛楼，故应当可以明确，在隆恩殿东暖阁中兴建佛楼应是帝陵专有的规制。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未时，执掌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在中南海仪鸾殿去世。在隆裕太后主导的慈禧治丧活动中，极大地提高了其丧仪标准，特别是在议谥中这一倾向表现得更为明显，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的起居注中直接记到：

二十日壬寅，上诣长春宫皇太后前请安，内阁奉谕旨，钦惟大行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太皇太后德涵万有，泽被群生，秉坤元而协乾元，以母范而兼帝范，垂帘训政，垂帘历四十七年，重译来宾，声誉播于五洲……今据内阁各部院衙门敬谨拟上尊谥，仰惟慈爱，追慕无穷。躬谨于徽号十六字

21 “……两处千万要一样高低，不可分别粗细，花活均要细腻鲜明。”详见同治十二年五月初五日《堂谕档普祥峪菩陀峪纪事》，转引自王蕾：《清代定东陵建筑工程全案研究》，2005：85。

22 “奴才载迁、荣颐、英廉跪奏为恭摺奏闻仰祈圣鉴事，窃奴才等准理藩院咨称具奏前藏达赖喇嘛专差堪布叩谒定东陵呈进供献等因一摺于五月十五日奉硃笔圈出尚书绍祺钦此……二十四日辰刻带领护印扎萨克喇嘛堪布喇嘛等叩谒定东陵呈进贡物佛尊奏书等件，奴才等恭率司员于隆恩殿前檐下陈设黄案将奏书、哈达、佛尊、画像供于案上，藏香红花列于两旁……奴才等率领司员经启隆恩殿门谨将佛像十八尊，画像九轴暂供东暖阁内，详查历届成案镀金佛像供奉东暖阁佛楼案上画轴佛像请至隆福寺庙内供奉。恭查定东陵隆恩殿东暖阁内原无佛楼所有佛像十八尊画像九轴可否一并请至隆福寺庙内供奉抑或成做供案即供东暖阁内，奴才未敢擅便理合请旨恭候命下。朱批：镀金佛像十八尊著成做供案敬供东暖阁内，该衙门知道。光绪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见载迁、荣颐、英廉：《奏为达赖喇嘛专差叩谒定东陵镀金佛像可否请至隆福寺庙内供奉等事宜请旨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4-01-14-0083-011。

23 时任达赖喇嘛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此次进贡事详见《色楞额等奏慈安太后丧事诵经事毕达赖等派专差堪布请安进贡折》，载《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31。

24 因此时光绪帝尚未亲政，制作供桌的旨意实为慈禧太后所发。

敬谨全留，合之恭上尊谥称曰：孝钦慈禧端佑康頤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²⁵

慈禧在隆裕太后的主导下获得了远超同为咸丰帝皇后的慈安太后的谥号，再结合其驾崩后的基本政治格局和停灵皇极殿和议谥活动中体现的浓厚的太后称制思想。笔者大胆推测，慈禧丧仪中处处逾制比拟皇帝的原因或不在慈禧，而系隆裕太后有意为之。其试图用比肩皇帝的慈禧太后丧仪标准，为自己试图代帝临朝称制、把持政权做舆论准备。

在慈禧最终的政治遗嘱中，对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的职权有明确分工：

谕旨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太皇太后懿旨：昨经降旨持命摄政王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着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²⁶

以此遗诏可见慈禧最初的设计是由监国摄政王载沣总理清廷中央日常工作，隆裕太后对重大事件具有最终决策权。但事实上，隆裕太后在慈禧驾崩后长期处于与监国摄政王载沣的争权拉锯状态之中，且一般认为在慈禧驾崩后初期，载沣权力主要在外朝，而宫内事务上，隆裕太后具有绝对权威²⁷。自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起，载沣前往隆裕所居长春宫请旨次数明显增多，且在这一时期载沣令将监国以来改为铃章署名后的所有谕旨、交旨各件，另缮黄册，分为两函，进呈隆裕御览²⁸。由此可见，大约从宣统元年年

25 书同文古籍档案文献数据库：《清代历朝起居注合集·清德宗》，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卷八十，第40页。

26 书同文古籍档案文献数据库：《清代历朝起居注合集·清德宗》，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卷八十，第42页。

27 “监国摄政王体制的最大难题，在于如何建立载沣、隆裕之间微妙的权力关系。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隆裕才有宣统朝皇太后的权位，但其与载沣的权势分配问题随即出现。为应对恭亲王溥伟等人的异动，禁城住宿人员除照例轮班者外一律清场。但以何名义发布诏令，张之洞与奕劻有不同意见。许宝衡对此有关键性的记述：“张相谓此件系发端之初，宜再斟酌。庆邸谓此乃宫内事，不能不用摄政王面奉懿旨。”结果依照奕劻之意，以“摄政王面奉皇太后懿旨”的方式颁行内阁。此旨明确隆裕、载沣的君臣地位，后者不能干涉宫内事。随后，载沣穿孝百日，赏贵太妃、贵妃公费银，新帝万寿日期，皆以摄政王奉懿旨的方式颁行。隆裕挑选这些宫内事似是有意为之，意在明确自己凌驾众人之上的至尊地位。”详见李欣荣：《臣掌君权：载沣摄政礼节纷争与宣统朝权势新局》，《清史研究》2021（5）：126。

28 《监国摄政王铃章军机大臣钦奉》，见《大公报天津版》，宣统元年十月二十九日，第2张第1版，《大公报》（1902—1949）全文检索数据库，编号：6430。

末开始，隆裕太后在外朝的政治话语权逐步增强，且继续对宫内事务享有最高决策权。这与一个月后载瀛提议为菩陀峪定东陵兴修佛楼的时间或有密切关联，颇意味。

宣统元年七月庚戌，军机大臣奉到隆裕太后懿旨：

菩陀峪定东陵金券内宝床上供奉之玉佛、玉寿星、镶嵌珠宝壶盖，着载瀛等即行请至隆恩殿东暖阁供奉。又此次内务府送去金塔二座一并供奉在东暖阁内玉佛两旁。所有应用供案着该管大臣敬谨豫备。²⁹

可见，至迟到宣统元年七月，菩陀峪定东陵仍未有任何修建佛楼的计划，仅计划循慈安太后例制造桌张供奉。八月，张之洞去世，清廷失去唯一能够斡旋皇室各派的股肱汉臣。载沣随即面临隆裕的步步进逼，摄政体制渐被破坏³⁰。

宣统元年十月初四日，隆裕太后前往定东陵参加奉安慈禧宫典礼，皇帝和监国摄政王并未同行³¹。十月十六日起，载沣奉懿旨隔日至长春宫向隆裕奏事³²。隆裕逐步攫取了载沣的摄政权力。十一月初十日，东陵守护大臣贝勒载瀛上《奏请修建定东陵佛楼事》³³一折，提出要在定东陵仿照咸丰帝定陵修建佛楼：

奴才等案查同治五年四月十九日准理藩院咨开因前后藏喇嘛恭诣定陵呈进佛像等贡，曾经仿照裕陵佛楼规制修建佛楼一间以备供奉佛像之用而昭敬慎。此次菩陀峪所有供奉金佛玉佛玉寿星陈设等件均关紧要，拟请援照定陵成案在东暖阁修建佛楼一间以备供佛并尊藏陈设俾昭严密，可否之处恭候钦定。如蒙俞允其工程归工程处修理，抑或归奴才等督饬司员敬谨修理所有慎重陈设缘由敬谨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在第二年，继任东陵守护大臣辅国公意普又上《奏为遵旨修建定东陵佛楼现在勘办情形事》一折，正式决定按照惠陵样式修造菩陀峪定东陵佛楼，并对事关“殿廷规制”

29 书同文古籍档案文献数据库：《清实录》，宣统元年，卷一七，第5页。

30 李欣荣：《臣掌君权：载沣摄政礼节纷争与宣统朝权势新局》，《清史研究》2021年第5期，第138页。

31 书同文古籍档案文献数据库：《清实录》，宣统元年，卷一六，第29页。

32 《摄政王诣长春宫奏事》，《大公报》，宣统元年十月二十日，第2张第1版。转引自：李欣荣：《臣掌君权：载沣摄政礼节纷争与宣统朝权势新局》，《清史研究》2021（5）：138。

33 载瀛：《奏请修建定东陵佛楼事》，宣统元年十一月初十日，档号：04-01-37-0148-0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的普陀峪定东陵隆恩殿东暖阁提升天花工作计划进行请旨³⁴。

由元年七月军机所奉谕旨和前述两折内容可知，载瀛上折倡修佛楼的日期在隆裕太后参加奉安大典一个月后，其很可能在隆裕太后参加奉安大典时得到了太后视察普陀峪定东陵后给出的明确授意，且升高隆恩殿暖阁天花事关殿廷规制的更改，加之规格上明确对标裕、定、惠三座帝陵，笔者认为若无最高层的明确旨意，先后两任东陵守护大臣的载瀛和意普不会冒着这么重大的政治风险积极推动此项突破既有惯例，在前一年刚刚竣工的隆恩殿上斥巨资大兴拆改的陵寝改建工程。

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有普陀峪定东陵佛楼的全套画样（见图五 - 图九），此画样应系从宣统二年七月初十日东陵守护大臣意普《奏为遵旨恭修定东陵佛楼敬拟做法绘图贴说并请派大臣勘估事》³⁵一折的附件。据画样可知，慈禧陵寝内佛楼的规制样式基本与保存至今的乾隆帝裕陵佛楼高度一致，唯为与大殿本体木植颜色保持一致，全用楠木造成。佛楼主体工程于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二十六日由和硕庄亲王载功移请神牌至配殿后正式开工³⁶。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初四日正式验收完工，十月十五日贝勒载润移请神牌还位³⁷。工期共耗时一年整，耗资二万二千一百九十七两二钱一分九厘。“内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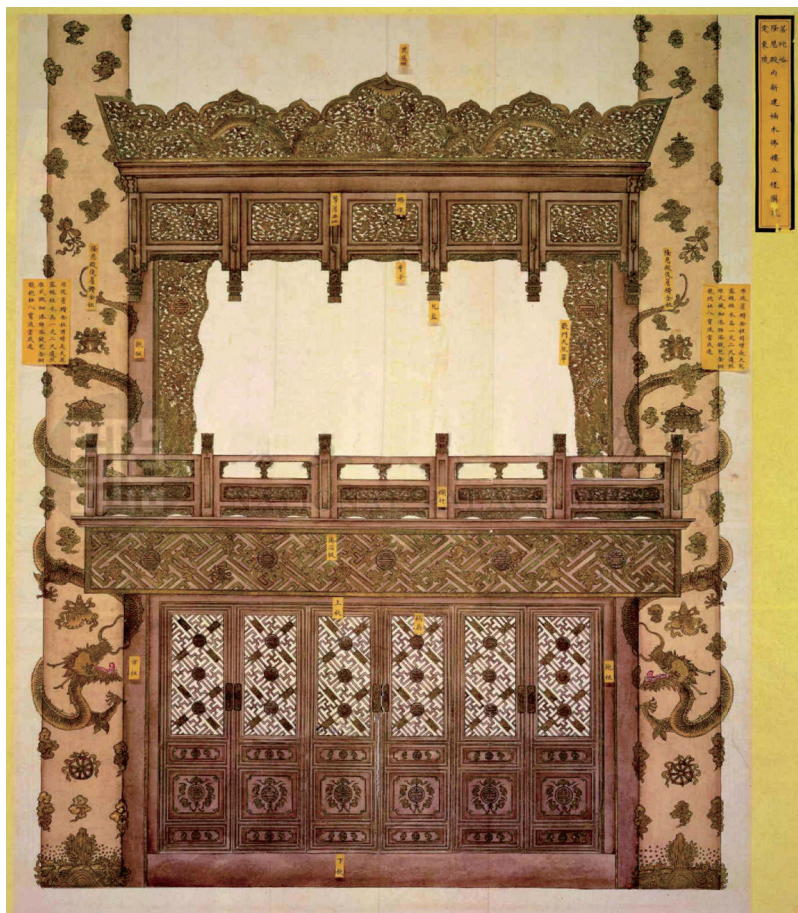
34 “臣意普苏鲁岱跪奏为遵旨修建佛楼谨将勘办情形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臣等恭查普陀峪定东陵享殿内供奉金玉佛尊并金塔陈设等件……拟请在东暖阁修建佛楼一间以备供奉尊藏而昭严密等因……彼时隆冬碍难工作迨至今春前任守护大臣载瀛屡因患病请假未及勘估，值此天气和暖正宜兴作，现经臣意普苏鲁岱率同司员先行恭诣裕陵、定陵、惠陵敬谨踏勘各座佛楼规制大略相同，惟惠陵佛楼规制壮丽。臣等拟请照式修理其外面雕刻漆饰等项均照依普陀峪定东陵享殿式样以归一律而壮观瞻。其受载沉重之木植均请用楠木以昭慎重再查东暖阁内天花板仅高一丈四尺五寸，佛楼之高总在二丈三尺有余，高低不敷应用臣等拟请将天花板尺寸升高以容修建事关殿廷规制臣等未敢擅专，可否之处恭候钦定，俟命下之日臣等先将金玉佛尊并陈设等件请至西暖阁供奉。敬谨尊藏再行督飭算房覆实估计钱粮，奏请飭部拨款一面咨行钦天监择吉开工趁时敬谨修理，以期早日竣事。所有修建要工勘办情形恭摺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朱批：著照所请敬谨修建该衙门知道。宣统二年四月初四日”意普：《奏为遵旨修建定东陵佛楼现在勘办情形事》，宣统二年四月初四日，档号：04-01-37-0149-0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35 意普：《奏为遵旨恭修定东陵佛楼敬拟做法绘图贴说并请派大臣勘估事》，宣统二年七月初十日，档号：04-01-37-0149-0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36 《为呈报宣统二年普陀峪定东陵修建佛楼朱笔圈出庄亲王载功移请神牌于配殿供奉起程日期事》，宣统二年七月，档号：06-01-001-000682-016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37 《为呈报宣统三年贝勒载润前往定东陵佛楼工竣移请神牌还位行祫告礼差竣回京及恭请圣安日期事》，宣统三年十月十七日，档号：06-01-001-000683-020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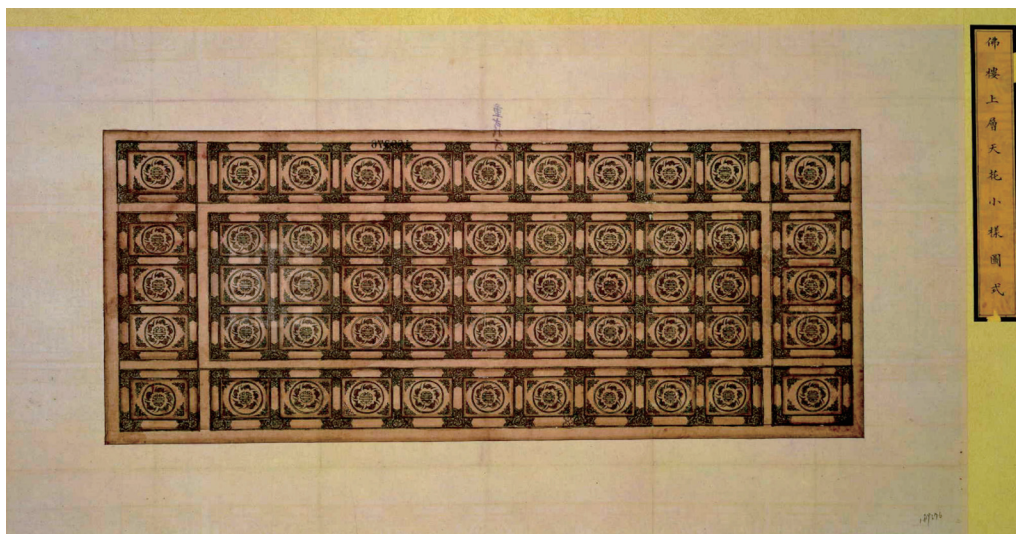
花样做法与殿内原式相同，金漆辉煌壮丽观瞻。”³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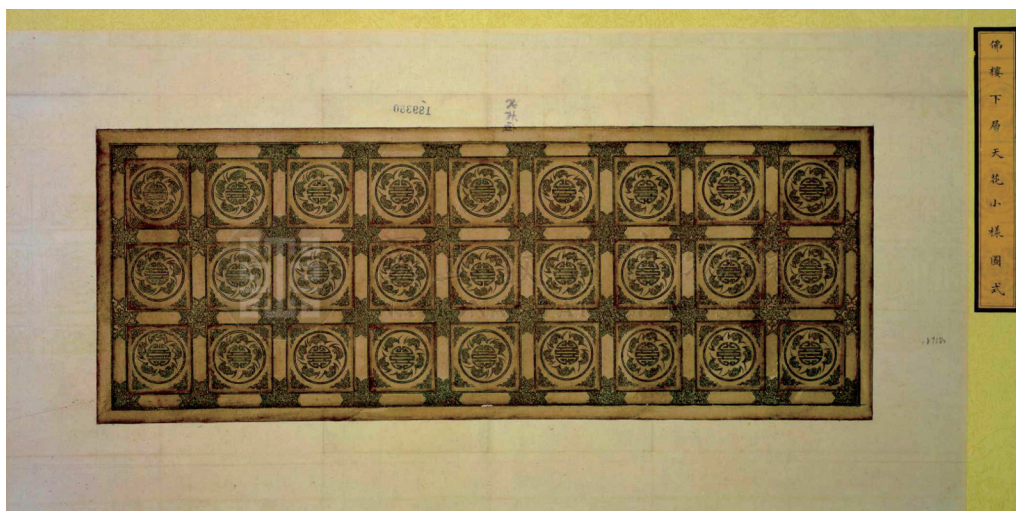
图五 普陀峪定东陵隆恩殿暖阁内仙楼式佛楼³⁹

38 “臣意普全荣苏鲁岱跪奏：为遵旨修建佛楼工程……臣等即于去岁春融率同司员勘仿惠陵佛楼规制照式修理，惟所需工料钱粮臣衙门向无勘估成案可稽，曾将拟用楠木及详细做法绘图贴说恭呈御览并请钦派大臣核实勘估等因，复于宣统二年七月初十日具奏奉旨著派绍英前往敬谨查勘钦此，随经该大臣带同司员恭往普陀峪定东陵享殿工次勘估钱粮通共估需银二万二千一百九十七两二钱一分九厘，覆奏移交臣等钦遵办理等因在案，遵将原估钱粮银两委员由部领回遵派妥慎司员招派厂商购办木植金漆物料带匠遵吉开工敬谨修理仍一面督饬司员按日轮流驻工监修以昭慎重，去后兹具该司员等报称修建要工现已完竣等情前来臣等遵即会同恭往详细查看，新建佛楼工程俱系工坚料实内外花样做法与殿内原式相同，金漆辉煌壮丽观瞻。核与原拟木植做法均属相符，臣等公同熟商谨拟于八月十三日申时将金玉佛尊寿星并金塔陈设等件由臣等率同司员敬谨移请于佛楼内遵照原列次序敬谨供奉尊藏以昭敬慎，并将隔扇掩闭封锁，俾期严密所有应行择吉移请神牌还位一切事宜相应请旨飭下典礼院照例办理，所有修建要工完竣并移请佛尊陈设日期缘由谨恭摺覆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朱批：该衙门知道。宣统三年八月初四日。”

39 《普陀峪隆恩殿定东陵陵内新建楠木佛楼立样图式》，189390 号军机处档案附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六 佛楼上层天花小样图式⁴⁰



图七 佛楼下层天花小样图式⁴¹

40 《普陀峪隆恩殿定东陵陵内新建楠木佛楼立样图式》，189376号军机处档案附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41 《佛楼下层天花小样图式》，189380号军机处档案附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八 神台立样图式⁴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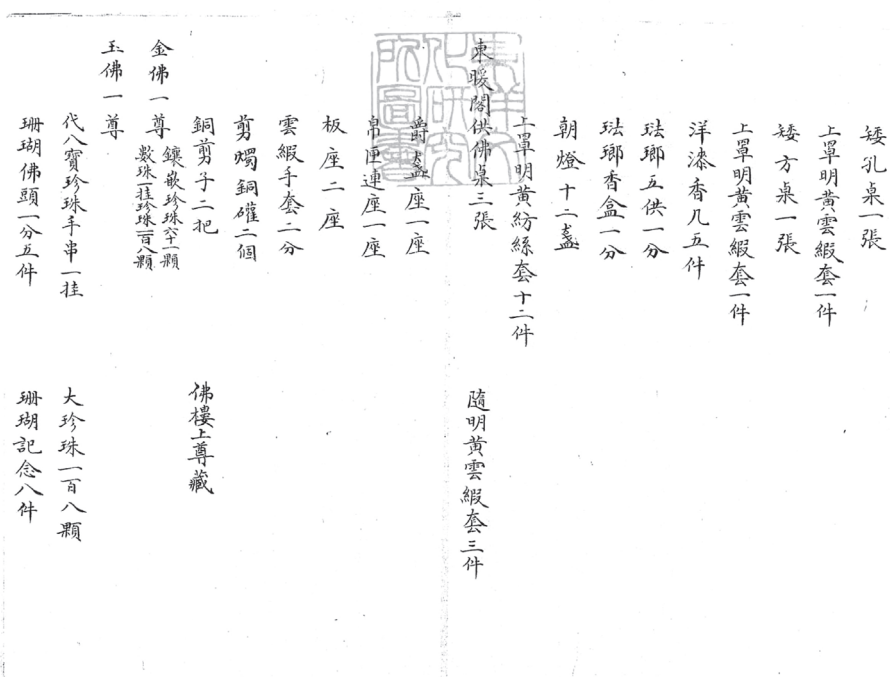


图九 欢门天然罩立样图式⁴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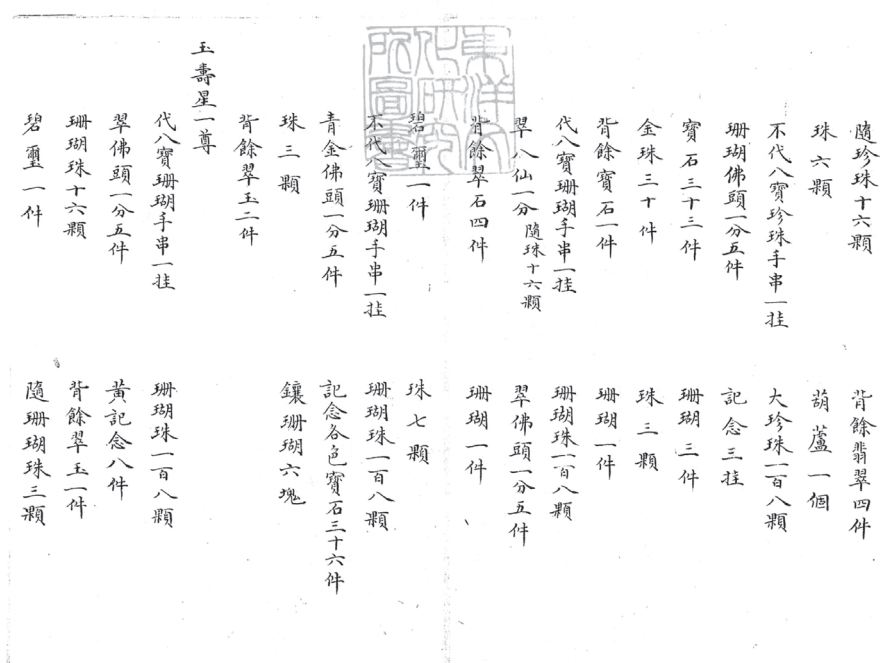
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藏宣统四年（1912年）写本《普陀峪定东陵陈设软片一切事宜清册》对普陀峪定东陵佛楼的陈设情况记载相当详细，且从佛楼已经建成，宣统元年七月所送来两座金塔已经就位的情况来看其应为佛楼竣工后的最终陈设状态，为便于学界后续使用，笔者将其影印件原文转录于此：

42 《神台立样图式》，189377号军机处档案附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43 《欢门天然罩立样图式》，189379号军机处档案附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一〇 《普陀峪定东陵陈设软片一切事宜清册》第 8-9 页



图一一 《普陀峪定东陵陈设软片一切事宜清册》第 10-11 页

不代八寶珍珠串一挂	大珍珠一百八顆
珊瑚佛頭一分五件	隨翠珠八件
記念一分	珊瑚珠三十顆
寶石三件	珠三顆
背餘一分	翠石一件
碧玉三件	珠六顆
足金鑲珠石萬壽執壺二件	
上頂六釐東珠十二顆	共重京平二百九十五兩七錢
小搭椰四毫東珠四十八顆	小如意頭一釐東珠十二顆
腰箍一釐東珠十二顆	小搭椰四毫正珠二十四顆
過圓三釐東珠十四顆	蓋上四釐東珠三十六顆
大搭椰六毫東珠四十八顆	大如意頭五毫東珠十二顆
菊花一釐東珠三十六顆	大搭椰六毫正珠八十四顆
網絡四毫正珠七百九十二顆	結當一釐二毫東珠七十二顆
座上八釐東珠四十顆	穗子一釐五毫正珠七十二顆
藍寶石墜角十八件	紅寶石墜角十八件
鑲紅寶石三十八件	珊瑚鑲松石六件
共計大小正珠一千三百二十四顆	鑲嵌不齊欠紅寶石一件
	小東珠三百四十八顆
	大東珠四十顆
	中東珠六十顆
	正珠八百七十六顆

图一二 《普陀峪定东陵陈设软片一切事宜清册》第 12-13 页

共計紅寶五十六件	共計藍寶石十八件
共計珊瑚鑲松石六件	花梨匣子一箇上嵌脂玉九件
足金鑲珠石萬壽執壺二件	
上頂八毫正珠十二顆	共重京平二百一十五兩四錢
小搭椰四毫正珠七十二顆	小如意頭一釐正珠十二顆
腰箍四毫正珠十二顆	過圓四釐正珠二十四顆
蓋上六釐正珠三十六顆	大搭椰六毫正珠一百三十二顆
大如意頭一釐五毫正珠十二顆	結當一釐正珠七十二顆
菊花一釐二毫正珠三十六顆	穗子一釐二毫正珠七十二顆
網絡一毫正珠七百五十六顆	紅寶石墜角十八件
座上二釐正珠四十顆	珊瑚鑲松石六件
藍寶石墜角十八件	欠紅寶石一件
鑲紅寶石三十八件	中正珠六十顆
共計大小正珠一千一百八十八顆	大正珠四十顆
共計紅寶石五十六件	小正珠一百八十八顆
共計藍寶石十八件	
共計珊瑚鑲松石六件	
花梨匣子一箇上嵌脂玉九件	

图一三 《普陀峪定东陵陈设软片一切事宜清册》第 14-15 页

足金珠萬壽盃盤四件	共重京平七十三兩五錢
上嵌五分東珠二十顆	
花梨匣子一箇上嵌脂玉五件	
金鑲石脂玉萬壽盃盤二件	
大脂玉萬壽盃一件	共重京平五兩二錢九分
金玉萬壽盃盤二件	銀金鑲石萬壽盃一件
小脂玉萬壽盃一件	共重京平八兩零七分
花梨匣子一箇上嵌脂玉五件	足金萬壽盃一件
雕刻脂玉如意准柄	
金寶塔二座	重一千四百七十四兩零六錢一座 重一千四百七十四兩二錢一座
西暖閣內尊藏陳設衣服開後奉安前交到樟木匣二十六件內	漆盤一件
匣一件內盛	小銀鑲二件
象牙簽大小三件	洋料滙子罐六箇
匣一件內盛	簾方盤一件
抵子一捆	銅洋錢一箇
磁罐一箇	

图一四 《普陀峪定东陵陈设软片一切事宜清册》第 16-17 页

从这本清册中体现的文物品类来看，除金玉佛尊和两座重达一千四百余两的金塔外，尚有杯盘、执壶若干，均镶嵌繁复，工艺精湛。因描述简单，尚不清楚佛楼中所供佛像是否与不久前十三世达赖喇嘛觐京朝见事件所进贡礼相关，东陵部分殿内陈设曾因民国初年遵化地区时局动荡在 1916 年运至故宫保存，普陀峪定东陵佛楼内陈设应亦有涉及，但具体转运清单暂未发现。殿内陈设所余部分应为孙殿英盗掠事件所毁。

三、佛楼的湮灭

1928 年 7 月，孙殿英率军盗掘清东陵，清东陵陵区内的各帝、后陵均受到严重盗扰，普陀峪定东陵更是因其陪葬品丰富珍贵而受到重点盗掘。除地宫被盗掘外，地面隆恩殿内陈设更是基本被盗运一空。逊帝溥仪得知这一事件后，迅速组织以镇国公载泽为首的清室代表前往东陵进行善后，载泽于 8 月 20 日抵达东陵陵区查勘各陵，后向溥仪上《载泽等查勘陵寝残毁情形清单》一折：



图一五 普陀峪定东陵隆恩殿东暖阁上部梁架现状（杨莹摄）

“载泽溥忻耆龄宝熙陈毅等查勘：普陀峪定东陵神厨库门窗、坎框全失。东西朝房门窗、坎框全失。东班房门窗全失。隆恩门门扇全失，门框砍去一半。隆恩殿隔扇、坎框、窗棂、天花板、天窗全失。神龛、佛楼全失。东西配殿隔扇、坎框全失。琉璃门坎框全失……”⁴⁴

从前文可知，普陀峪定东陵佛楼为追求与殿内整体装修相称，整体采用楠木建造。再加之工艺精细，经济价值较高。其与隆恩殿的楠木天花板一起，在孙殿英的盗扰活动中被整体拆盗。因普陀峪定东陵开放参观年代较早，且在暖阁办有常设展览，现暖阁内已几无当年佛楼的痕迹，唯梁架上尚存当年孙殿英盗掠的遗痕（图一五）。

⁴⁴ 《载泽等查勘陵寝残毁情形清单》，转引自于善溥：《慈禧乾隆墓被盗始末》，政协唐山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1993：75。

四、结语

菩陀峪定东陵无论从其施工工期和耗银总量看都堪称清代后陵之最，即便与帝陵相比也不遑多让。其恢弘的建筑形制、精致奢华的内檐装修都体现了慈禧作为晚清近半个世纪实际统治者的赫赫威严。其暖阁内佛楼也是以尊奉黄教为国策的清皇室以国家行为兴建的最后一座以陈供藏传佛教造像、祭法器的宗教殿宇。其突破了后陵不建佛楼的制度性传统，完全采用了帝陵的佛楼规制进行建设。从佛楼用木和体量规制上看，菩陀峪定东陵佛楼丝毫不逊于裕陵为代表的帝陵佛楼。其建设始末正贯穿了宣统朝隆裕太后和监国摄政王载沣持续数年的争权斗争，其兴建或与隆裕太后借由帝王化慈禧以期继承其政治遗产有一定联系。但因档案材料所限，此仅作为一猜测，希望随着档案材料进一步的公开，这一猜测能获得更加确凿的直接证据。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关于菩陀峪定东陵佛楼修建的档案材料约有近二十余条，笔者择取要旨按时间顺序编成《菩陀峪定东陵隆恩殿佛楼史料索引》一表如下：

附表一 菩陀峪定东陵隆恩殿佛楼史料索引

时间	相关人员或机构	档案题名	档号
宣统元年十一月初十日	东陵守护大臣载瀛	《奏请修建定东陵佛楼事》	04-01-37-0148-024
宣统二年四月初四日	东陵守护大臣意普	《奏为遵旨修建定东陵佛楼现在勘办情形事》	04-01-37-0149-014
宣统二年五月十四日	礼部致宗人府	《为片取菩陀峪定东陵东暖阁修建佛楼工程恭捧神牌王等銜名事致宗人府》	06-01-001-000682-0100
宣统二年七月初九日	庄亲王载功	《为菩陀峪定东陵修建佛楼移请神牌奉朱笔圈出庄亲王载功恭捧神牌等事致宗人府等》	06-01-001-000682-0129
宣统二年七月初十日	东陵守护大臣意普	《奏为遵旨恭修定东陵佛楼敬拟做法绘图贴说并请派大臣勘估事》	04-01-37-0149-018
宣统二年七月十一日	礼部致陆军部	《为菩陀峪定东陵修建佛楼移请神牌告祭后土之神运送祭器等项应用抬夫回夫请照数拨给等事致陆军部》	15-01-001-000027-0233
宣统二年七月十八日	顺承郡王讷勒赫	《为呈报宣统二年定东陵修建佛楼移请神牌派顺承郡王奉派行祇告礼起程日期事》	06-01-001-000682-0145
宣统二年八月	庄亲王载功	《为领出宣统二年菩陀峪定东陵修建佛楼庄亲王奉派移请神牌所需盘费银票事》	06-01-001-000682-0173
宣统三年八月初四日	东陵守护大臣意普	《奏为遵旨修建定东陵佛楼完竣并报移请佛尊陈设日期事》	04-01-37-0149-046

续表

时间	相关人员或机构	档案题名	档号
宣统三年十月初十日	贝勒载润	《为宣统三年十月菩陀峪定东陵佛楼工竣移请神牌还位奉旨派贝勒载润行祇告礼事致宗人府等》	06-01-001-000683-0193
宣统三年十月十七日	礼部致宗人府	《为呈报宣统三年贝勒载润前往定东陵佛楼工竣移请神牌还位行祇告礼差竣回京及恭请圣安日期事》	06-01-001-000683-0203

◆ 王彦嘉 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副研究馆员

the Gan'en temple, and his family on the Dge lugs school in Amdo area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 study also sheds light on the clos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Gan'en temple and the three major Dge lugs monasteries in central Tibet during a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

Notes on the Creation, Transmiss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Golden Ink Kanjur Made in the Thirty-fifth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 Housed in the Palace Museum

Li Ruoyu

(The Palace Museum)

The Palace Museum has a collection of ninety-six volumes of the Kanjur written in Tibetan in golden ink made in the thirty-fifth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 (1770). The remaining twelve volumes are housed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Taipei, comprising a total of 108 volumes. The set was commissioned by Qianlong Emperor in celebration of his biological mother, the Empress Dowager Chongqing's eightieth birthday. Following the established style of the Kangxi period, this set of golden ink Tibetan Kanjur represents the highest level of craftsmanship achieved by the Qing imperial workshops. It serves as a significant benchmark for subsequent Buddhist scriptures production in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This sumptuously decorated and bound Kanjur, written in golden ink on blue magnetic paper with a sheep brain paste base and adorned with turquoise, coral, and other precious jewels, demonstrates the pinnacle of Qing dynasty bookmaking. Originally housed in the Ci'yin House of the Ci'ning Palace, the set is now stored in both Beijing and Taipei after the southward evacua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s cultural relics due to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Maternal Model and Emperor Normalization —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Building in the Long'en Hall at the Dingdong Mausoleum in Putuoyu

Wang Yanjia

(The Palace Museum)

As the mausoleum of Empress Dowager Cixi 慈禧, who wielded substantial power for a long tim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Dingdong Mausoleum 定东陵 in Putuoyu 普陀峪 exhibits numerous distinctive features compared with other mausoleums of empresses in the Qing Dynasty. Among the seven imperial mausoleums of empress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only the Taidong Mausoleum 泰东陵, where Empress

Dowager Chongqing 崇庆, the biological mother of Emperor Qianlong, was buried, and the Dingdong Mausoleum in Putuoyu of Empress Dowager Cixi, have a dedicated Buddhist worship space built within the warm pavilion of the Long'en Hall 隆恩殿. Since the Buddhist building in the Dingdong Mausoleum was a later addition to the complex after Empress Dowager Cixi's burial, there is a natural discontinuity in the archival records associated with the major projects undertaken during the Guangxu 光绪 reign. Consequently, the construction history has not been extensively discussed. Completed on October 15th, 1911, this structure marked the end of a long tradition of palace religious architecture in the nearly three centuries of the Qing Dynasty. Tragically, both the Buddhist building itself and most of the interior decorations and furnishings of the Long'en Hall were completely destroyed by the tomb robberies of the Eastern Mausoleum by Sun Dianying 孙殿英 in 1928, leaving only a brief existence of a little over a decade. Through an analysis of archival materials from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s, the Ministry of Rites, the Ministry of Works, and the Office of Imperial Lineage, along with relevant drawings and blueprints,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and ultimate destruction of the Buddhist building in the Long'en Hall of the Dingdong Mausoleum in Putuoyu. Furthermore, the paper explores the potenti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uddhist hall and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Xuantong 宣统 reign.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ongpan-Heyuan Route during the Early Qing Dynasty

Zhang Qin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The "Road from Songpan 松潘 and Huangshengguan 黄胜关 to Tibet" documented in the Chinese local gazetteers of the Qing Dynasty is also called the "Songpan-Heyuan 河源 Route". Some studies have erroneously suggested that this road ran from Songpan through Hongyuan County 红原, Pema County (Pad ma, Banma 班玛), Darlak County (Dar lag, Dari 达日) to Matö County (Rma stod, Maduo 玛多) or passed through the east and west of Golok (Mgo log, Guoluo 果洛), then connected with the main road from Xi'ning to Lhasa.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route in question extended from Songpan, across the Dzörgé (Mdzod dge, Ruoergai 若尔盖) grassland to the Yellow River bend, then followed the northern side of the Amnyé Machen (A myes rma chen, Animaqing 阿尼玛卿) mountains to the north of Eling 鄂陵 lake in Matö County in the Heyuan area. This road was used to transport grain for Qing troops who entered Tibet from Qinghai to expel Dzungar in the late Kangxi period. However, it is not the only path connecting Songpan and Heyuan, historical records such as Wang Woshi's 王我师 *General Accounts about Tibet and Dartsedo* (Zanglu zongji 藏炉总记) and Filchner's *Quer durch Ost-Tibet* indicate the existence of an alternative route from Songpan to Heyuan via Golok.